

云南大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中国石油安全

吴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云南大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中国石油安全

吴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石油安全/吴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7
(云南大学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ISBN 7-5004-3936-9

I. 中… II. 吴… III. 石油—影响—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IV. ①F426.22②D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5497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谢 康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281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丛书受云南省省校教育合作项目基金资助

云南大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编委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鸿武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博士生导师

杨曼苏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 宪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志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俞正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倪世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丛 书 序

随着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也在加快；同时，随着近年来当代世界风云的急剧变幻（如苏东巨变、冷战结束、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国际关系学在中国也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成为一个令越来越多的人感兴趣的“热门”学科。国际关系不再是政治家、外交家和学者们的专属领域，它已变得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今天，“经济全球化”、“WTO”、“主权”、“人权”、“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综合国力”、“国家安全”、“北约”、“东盟”、“伊拉克”、“阿富汗”等名词术语，已成了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词语。

说国际关系在中国已日渐成为一门“显学”，主要是有这样几个显著的标志：

一是近年来中国大学里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院、系、所、中心迅速增加。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少数几个大学有国际政治系，加上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两个专业院校，培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人才的单位很有限。而近几年来，不但北大、复旦、人大的国际政治系都扩大升格为国际关系学院，一些原来没有国关（国政）院系的大学也都纷纷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或者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所）。据不完全统计，到 2002 年初，全国已有近 40 所大学有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或国际问题）学院、系、所、中心。

二是从事国际关系学科的教学、研究队伍迅速扩大。随着全国各高校中一批新院、系、所、中心的成立，从事国际关系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員也有了迅速的增加。在这些新增加的专业人士中，既有一大批国内自己培养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也有不少近年在国外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的“海归派”人才。除高校外，中央及各省市的政府系统、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新闻系统以及军队系统也有一批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有实力非常雄厚的研究和教学力量。他们同高校的交流、切磋日益频繁，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繁荣和发展。

三是选择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近年来，大学里无论是本科层次，还是硕士、博士层次，都有大批青年学子选择国际关系（或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学科）作为自己报考的专业。这样就使国际关系成了一个十分“热门”、竞争激烈的专业，录取的分数也相当高。除了内地考生外，越来越多的港、澳、台考生和外国留学生，也选择到中国内地来学习国际关系专业。与这一趋势相适应，全国越来越多的高校都设立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专业，获得了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的授予权。

四是有关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出版物数量增长很快，而且在市场上也很受欢迎。有人做过初步统计，近十年来，全国出版的有关国际问题的图书数量，每年都在以大约 10% 的速度增长。除此之外，有关国际问题的专业性刊物和各种综合性学术刊物（主要是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国际问题研究的文章也在增多。

这种“国际关系学热”的现象令人欣喜，也使我们从事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的人感到十分振奋。它表明了当代中国人对外部

世界的关注，也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开放的心态。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仍处于“不发达”阶段。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在西方国家已进入了繁荣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十分活跃，学派林立，体系纷繁，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层出不穷，各种著作和刊物汗牛充栋。而在中国，尽管国际关系学有了长足发展，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新兴的年轻学科。学科内有重要影响和高深造诣的学术带头人很少，高水平 and 原创性的成果还不多。这种状况与我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我国对外开放的现实需要是不相称的。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学科理论和体系（即我们常说的“中国学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组织编写的这套“云南大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丛书”，目的就是希望为构筑中国的国际关系体系大厦添砖加瓦，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的繁荣发展做一点贡献。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一所年轻的新学院，但同时也是一所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学院。说它年轻，是因为它 2002 年 4 月才正式挂牌成立；说它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是因为它的前身是成立于 1964 年、已有 40 年历史的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以及后来成立的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内的兄弟院校相比，云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特色和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传统。经过 40 年的积累，云大的国际问题研究已形成了自身的学术传统，尤其是在西亚、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研究方面，在国内外已有一定的学术影响；二是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与多个东南亚、南亚国家相邻和相近。现在，云南

省正在实施建设“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发展战略，并与周边国家开展了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开发、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合作、国际禁毒合作等一系列国际合作；正在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云南也将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为学院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然而，作为一所新学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非常需要得到国内兄弟院校的提携和帮助。近年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人大国际关系学院以及外交学院等在许多方面（如学术交流、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学位点申报等）都给了我们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在教育部的安排下，复旦大学与云南大学于2001年正式建立了对口支援关系。通过云南省实施的“省院、省校合作项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帮助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设“国际关系”重点学科。双方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这套“云南大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丛书”的编写和出版即是双方合作的成果之一。

我们计划出的“云南大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丛书”共十种；第一批先出五种。在选题上兼顾双方的特点和优势，复旦大学方面以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关系为主，云南大学方面以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地区国际关系和某些专题研究为主。在第一批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要感谢云南省实施的“省院、省校合作项目”给予的支持，感谢各位作者的辛勤劳动，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尤其是周兴泉先生）为丛书的编辑出版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肖 宪

2003年3月20日

前 言

1999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学院（SAIS）的科尔教授——这位曾经主编了《第二次油价崩溃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与世界石油市场》和《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能源政策》等学术著作的能源专家，在回忆起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时，曾颇有感触地对笔者说：“中国人（对石油影响民众生活）是没有切身体验的，也没有切肤之痛。”他的感触意味深远，不由得使笔者联想到了两件相互关联的事：

其一是我出国前夕（1997年）在《中东政策》杂志（美国出版）上看到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第七个生命》，作者在文中提到的一个问题让我难以释怀。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成功地提高油价之后，OPEC这个曾经被视为“没有牙齿的老虎”变成了“邪恶”的象征，人们对它的攻击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甚至有的美国人提出，“只要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官员一踏上美利坚的领土，美国就以反托拉斯法的

名义作为罪犯逮捕他们，不论是任何人”。^①

其二是不久前读到的一则报道，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表明，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带来了中国汽车消费的“超高速增长”，私家车拥有量不断攀升。仅是私家车一年消费的石油就有 1700 万吨。无独有偶。跨国汽车生产巨头的一名总裁也预测说，20 年之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前一事情令我难以释怀，其原因在于，美国人何以如此仇恨和敌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欧佩克国家和其人民，作为中国人，毋庸讳言，我们确实是没有切身体验的，虽然理论上我们可能心知肚明。在美期间，1997 年《哈佛国际评论》刊登的一幅图片，似乎使我找到了答案：1973 年冬季，瑟瑟寒风中，等待加油的汽车排成了长队。“汽油长队”成为了 1973 年石油危机期间美国人对石油这种极为普通而又极其重要的战略商品的最直接感受。与往昔石油过剩的年代相比，石油短缺与美国人的过去突然发生了“断裂”。“石油”这个字眼如此深刻地渗透到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和精神中去，这在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经济损失了 4 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要承担大约 2.5 万美元的损失。经济发展停滞，通胀严重，失业率升高，政府信任危机加重，人民怨声载道。不仅如此，石油问题还严重束缚和制约着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极大地影响到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以及对外战略利益。如果说，20 世纪是美国世纪的话，其辉煌历史中也不乏数次失败的痛苦经历。其中，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石油危机可能是感受最深刻、最严重和最痛苦的经历之一了。尤其是，当这种感受是发生在和平

^① Jahangir Amuzegar, "OPEC's seventh life", *Middle East Policy*, vol. v, no. 3, Sept. 1997, p. 25.

年代。

后一件事情既令人鼓舞，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但又使我们不得不有所警惕和忧虑。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汽车时代以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的速度来临了。光荣与梦想？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然而，“汽车文化”发展不仅仅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经济发展和国家地位上升的标志。汽车文化是与石油这种极为普通而又极其重要的战略商品紧密相关和密切相连的，是建立在坚实的石油供应安全和合理的价格承受水平基础之上的。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的历史性转变。这一年，中国由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变成了一个石油净进口国。这一转变几乎是静悄悄的。自此以后，中国石油进口量有增无减，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日益凸现。200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达到了7000万吨，占当年国内石油消费水平的大约30%。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继续增长，对外石油依赖程度在未来20年内将达到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时美国的水平，甚至还要高。石油供应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国家对外战略利益的重要头等问题。如果在此期间也爆发如1973年和1979年那样的石油危机，中国是否会出现1/4世纪前美国经历的“汽油长队”现象呢？开始享受着“汽车文化”的中国人，又会经历怎样的痛苦呢？再进一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对外战略利益是否能够经受得起一次或多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呢？

二

虽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有人会觉得石油安全是一个新瓶老醋的问题，已无多少争论的必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就预见到了石油在未来战争中的

重要性以及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的战略意义。石油供应安全问题在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初步验证。1945年以后全球充足和低廉的石油供应促成了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然而好景不长。战后初期中东两次政治危机差点就触发了世界性的石油供应问题。而1973年第一次石油供应和价格危机在战后世界石油的心脏地带——中东，终于爆发了。1979年石油供应危机使石油进口国的经济进一步雪上加霜。19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石油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石油供应安全环境大大改善。1990年海湾危机虽然没有演变成为一次全球性的危机，但也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动用了一切必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时刻处于防范危机的紧张状态之中。此后，西方国家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沾沾自喜，掉以轻心，石油供应安全问题仍然是西方国家头等关切的重要经济和外交战略问题。甚至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夕，石油供应安全问题还被再次提上了西方国家的议事日程，其标志，一是美国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的出台，其二是欧洲联盟“21世纪战略能源的挑战”计划的问世。

从能源安全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石油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在不断变化之中。虽然自1970年代以来，石油市场的对抗逐步让位于对话与合作，石油供应日益多元化和透明化，中东地区以外的石油供应量稳步增长，石油安全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其核心内容仍然是石油的安全供给和油价的合理波动。石油安全的标准定义仍然是“一种以不中断经济进程的方式和价格水平满足需求的流动（a flow）”。^①防止石油供应中断和油价上涨对石油进口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冲击仍然是石油消费国家的

① V. D. Ladoucette, "Security of supply is back on the agenda", *Middle East Economic Survey (MEES)*, 18 Nov. 2002.

石油安全战略核心内容。虽然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石油市场石油供应充足，但石油安全的概念仍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贸易和价格问题。像国家安全的概念一样，石油安全也是一种超乎市场领域、涉及到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战略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一种“流动”，就是因为石油安全随时会因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石油安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一次石油危机中，任何依赖进口石油的国家都难以幸免，只不过是受冲击和遭损失程度的差别而已。单个国家应对石油危机的政策在全球化时代已经不起作用。这种相互依存意味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集团与地区集团之间、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加强石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因此，我们在看待石油安全问题时，必须要有发展的观点，相互联系的视角以及宏观全局的眼光。

三

石油安全对今天的中国政治经济生活和对外战略还是一个新的概念与课题。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问题既是一个国内问题，同时，随着对外石油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又是一个国际问题。从国内问题的角度看，这一问题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初露端倪了，到1990年代进一步加速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石油生产和供应日益滞后于需求，导致进口石油的不断增多。保障可靠和安全的国外石油供应，日益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不得不严重关切的问题。从国际问题的角度看，由于国际石油市场和油价频繁变动，并受到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影响，随着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石油依赖的不断加深，中国的石油安全风险系数亦随之日益加大。

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重大挑战是，21

世纪上半叶,或者说至少在未来 20 年内,世界石油供应是否充足,国际油价是否能够在—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波动。也就是说,未来 20 年内,世界石油供应和国际油价是否继续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既是西方国家严重关切的问题,也是刚刚迈入石油进口消费大国行列的中国不得不关注的问题。这需要对未来的国际石油供应和油价前景进行充分的研究、分析和把握。就此挑战而言,目前国内外的分析研究大都表明,如果国际石油供应不受国际政治和地缘斗争的影响而正常运行,至少今后 20 年内,全球石油供应是有充分保障的。国际能源机构的研究报告就认为,今后 20 年内,“总体上看世界的石油资源基础不是一项限制性因素”,^①全球石油供应能力将继续增长,未来的石油供应足以满足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全球石油供应基础不是一项限制性因素,同时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将缓慢增长,因此理论上应该说,国际油价也应该是平稳发展的,不至于出现大涨或暴涨的局面。也就是说,在未来 20 年内,排除政治因素,中国对国际石油的需求应该是有保障的。但是,也要看到,几次重大的国际石油危机都不是市场供求失衡的问题,而是地区政治动乱和斗争的副产品。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全球石油资源基础和供应前景不存在大的问题,就轻易断言中国未来面临的石油供应安全是有保障的。石油安全从来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和现实,我们也不能仅从一个角度来考虑和分析问题。

其二,当今能源安全困境的根源在于世界石油资源分布的根本性失衡。波斯湾地区拥有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 64%,—直是世界关键的石油生产和出口中心。中国未来大部分进口的石油将不得不从这一动荡不定的地区获得,通过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

①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0*, OECD/IEA 2001, Paris, p. 60.

峡和南海，运输而来。显而易见，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既取决于波斯湾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同时又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政治以及南海和台湾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来自中亚和俄罗斯的油气肯定有助于中国石油供应来源的多元化，有利于国家的石油供应安全形势的改善，但是中东石油仍然是“重中之重”。这是我们在分析和制定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至少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波斯湾的政治稳定与石油安全供应之间的“瓶颈”作用将继续存在。如果说，中国过去在中东地区没有重大的战略利益，那么，再过10—20年，如果再说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仅仅“战略性”的，可能将是轻描淡写了。正是中东石油日益凸现的战略价值，中国的中东政策可能不得不重新定位。此外，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政治以及南海和台湾问题对中国的石油运输安全也有重大影响，石油因素无疑将会使中国面临的这些地区性问题越来越复杂化。对此，我们必须要有预见性和战略前瞻性。

其三，石油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而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石油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总是与国际政治斗争、全球战略利益争夺、甚至社会意识形态、人权、民族宗教冲突和矛盾逐影随行。中国对石油安全的关注“正在越来越影响到中国的外交和战略方程式”。^①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不仅会受到与供应安全链紧密相关的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事态发展的影响，而且会受到大国的竞争和挤压。比如，美国的影响。虽然在稳定国际石油市场和油价等安全问题上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立场越来越接近，但深层问题和风险仍然存在。美

^① A. M. Jaffe and S. W. Lewis, "Beijing's oil diplomacy", *Survival*, vol.44, no.1, Spring 2002, p. 115.

国不仅在中东，而且在世界上重要的产油区都有重大的石油安全利益。可以说百余年来，美国的对外关系史，也是一部对全球战略资源（包括石油）的争夺史。这个“汽车轮子”上的超级大国是建立在对全球石油争夺和控制的基础上的。由于美国国内供给能力的继续下降，对外石油依赖的有增无减，可以预言，美国仍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其对全球石油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尽管伊拉克战争不完全与石油争夺有关，但是，人们从中也不难发现石油的色彩和气味。美国副总统切尼就曾表示，萨达姆·侯赛因之所以拥有“威胁”世界的能力，就是因为“他坐在10%的世界石油资源宝库之上”。^①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对中东石油的控制将进一步加强。从石油安全的角度看，由于国家战略资源角色的转换，为了保障获得安全和稳定的国外石油供应，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恐怕仍然不得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同舟共济”，不得不“主动”维持一种稳定和协调的双边或多边外交关系。^②就石油安全问题而言，中国的外交目标应该是“以实现国内能源安全利益的最大化的方式，参与全球能源体系。”^③我们必须预见到，在未来的中国与美国关系中，石油将可能成为另外一个重大的、可能影响到双边和多边关系的不确定因素。^④

其四，中国石油安全战略的关键一环，是要做好应对国际石

① Anthony Sampson, "West's greed for fuels Saddam fever", *The Observer*, Sunday, August 11, 2002.

② 埃德·布兰奇，“中国的中东石油外交”，英国《中东》月刊2003年1月号。

③ IEA, *China's Worldwide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 OECD/IEA Publications, Paris, 2000, p. 62.

④ David Platt, "The quest for energy to grow",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20, 2002.